

蒙书·蒙童·蒙师

◎张万银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历来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优良传统,《易经》六十四卦中,第四卦蒙卦就专门谈启蒙教育。蒙书、蒙童、蒙师,构成了启蒙教育的3个要素。

所谓蒙书,是中国旧时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所用读物的总称,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学者研究认为,最早的蒙书是西周时的蒙童识字课本《史籀篇》。到秦代,李斯等人编写了《仓颉篇》,作为初学者的启蒙识字读本。这两种字书开启了蒙书之先河,但今已亡佚不存。流传至今最早的字书是西汉时史游编写的《急就篇》,由于其实用性强、知识量大,对后世蒙书的发展影响甚巨。

汉以后的唐、宋、元诸代,蒙学书籍泉涌风发,至明清更是蔚为壮观,从源头仅可滥觞的一泓清浅,发育成湖平两岸阔的浩浩百川。教育家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中谈到,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展读过五六千种童蒙读物,可见其种类之多,阵容之大。其代表作“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宛若占尽风情向小园的老梅,至今仍暗香浮动,嘉惠莘莘学子。近年来,在“少儿读经”“国学启蒙”活动风靡全国,其中就有经典蒙书的清芬氤氲,倩影闪动。

宋元以降,规定儿童上学,先读蒙书——“初入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明代吕坤《社学要略》)《邓云乡讲北京》中的“学府述略”一章中说:“教材由启蒙到高深……一直是《三》《百》《千》识字启蒙,然后读‘四书’‘五经’。”可见蒙书连着四书五经,是旧时教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蒙书的编撰者有硕学鸿儒,也有村野学究。虽然编撰者各有不同面目,各具时代特色,但注重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的教育是其共同特点,这正是我国古代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成熟的体现。蒙书中既有儒家经典的基本精神,又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验;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具体实用的日常知识;既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又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因此,千百年来,上至扶杖翁,下至垂髫童,读书人口诵心惟,无不知晓。《蒙书精华·前言》指出:“这些蒙书对人们的思想、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

“古有千文义,须知学后通。圣贤俱间出,以此发蒙童。”(宋汪洙《神童诗》)从周代开始,蒙童一般都是8岁左右启蒙。古人认为,欲立根基无如为善,能光门第只有读书。因此,蒙童入学是人们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体现在社会风俗之中,便有种种近乎虔诚而又令人莞尔的举动。有的地方,蒙童上学的第一天即便是晴空丽日,也要点上一个灯笼拎着,灯笼上还要绑上一根鲜葱,为了讨一个好

口彩——“聪明”,正应了苏东坡的一句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有的地方,上学的第一天要带上一包“上学糕”,用糯米粉做成的,染上鲜艳的色彩,供在孔夫子牌位前,一是表达敬意,二是“糕”与“高”谐音,祈求至圣先师保佑能攀蟾折桂,高中状元。有的地方,蒙童初次上学时要随身带粽子。这粽子做成四方形的,像古代官印的形状,名为“印粽”——希望学子学而优则仕,将来能执掌印把子,升官发财。

《幼学琼林》把蒙童入学称为“云程发轫”,发轫时要举行开幕式。通常是先拜孔子,后拜蒙师,然后由蒙师点读几句书,算是发蒙。对此,作家施蛰存于《沙上的足迹》一书中曾有描绘:“庚戌元宵,家君为行开蒙之礼,堂中铺红毡,烧红烛一对。先拜至圣先师神位,家君坐太师椅上,教读‘天地君亲师’五字,命我讲读三遍,礼毕。次日即入比邻徐氏家塾,始读《千字文》。”对“云程发轫”之情景,七十岁的施蛰存记忆犹新,其《浮生杂咏·四》写道:“郑重严亲为启蒙,上元灯下烛花红。明朝负笈从师去,天地元黄宇宙洪。”

“负笈从师”,便要恭敬如仪地听蒙师传道、授业、解惑。中国历来有尊师的传统,“天地君亲师”,可见位次之隆;“蒙以养正,圣功也”(《易经·蒙卦》),意思是启蒙是为了培养正道,这是圣人的功业,可见期许之高。蒙师肩负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重任,口碑好却待遇低,受人尊敬却一辈子清苦。据《古今诗话》记载,唐朝的薛令之做太子的蒙师,待遇微薄,就在墙上题一首诗,前四句是:“朝日上班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盘中餐尽是苜蓿类的东西,岂能不饥寒起怨心?后来“苜蓿生涯”就专门用来形容塾师的清苦生活。同样有过苜蓿生涯的郑板桥曾在《教馆诗》中慨叹:“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古人说,穷不习武富不教书。古时开馆授徒作蒙师的,往往是不才明主弃的落第寒士。他们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日后出名的都是学生,何曾有过先生?不过,蒙师出身的名人倒是有两个,一个是写鬼写妖刺贪虐的柳泉居士蒲松龄,一个是神机妙算惊天下的梁山军师吴用。但他们的名气皆非建立在“蒙以养正”上,而是拜改行所赐。

始终有一些蒙师不甘终老于苜蓿生涯,梦想冲出“三味书屋”,正所谓“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对此,经历了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之后的郑板桥,却另有一番见解,他的《道情》直言:“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和奶奶做“读书搭子”

◎程瑞

寒假,爸妈把奶奶从乡下接到了城里。奶奶不仅承担起家务,还常常陪伴在我身旁,用那双充满慈爱的眼睛盯着我学习。有时,奶奶用她那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摸我的书本,轻声细语道:“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你要好好学习啊。”我总是满口答应,却未曾听懂奶奶话语中的期盼。

一天,我偶然发现奶奶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翻看我的一本旧课本。我好奇地问:“奶奶,您在看什么呢?”奶奶抬头,笑眯眯地说:“我看这些字。虽然我不认识几个,但课本里的图画真好看,看着就亲切。虽然认不全字,但想着你读书的样子,我心里就欢喜。”我恍然大悟,或许我可以成为奶奶的“眼睛”,带她走进书的奇妙世界。

我灵机一动,提议道:“奶奶,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书,那我当你的‘读书搭子’吧!”奶奶闻言,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什么是‘读书搭子’?”我解释说:“‘搭子’是现在流行的陪伴方式,我们可以相互陪伴、分享经验、寻找共同兴趣。‘读书搭子’就是一起读书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书中的故事和感悟。奶奶,以后我来念书给您听!”奶奶一脸惊喜:“真的?可别嫌奶奶不识字!”我坚定地回答:“没问题,奶奶,咱们拉钩,一言为定!”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为奶奶的“读书搭子”,我们祖孙二人共同踏上了读书之旅。我捧起书,一字一句地读给奶奶听,奶奶坐在我身边,听得很认真。她时不时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或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理解有限,但话语中蕴含着不少人生的哲理。那些文字仿佛有了生命,跳跃在我们的耳边,也温暖着我们的心田。

有时,我会给奶奶读唐诗,我轻轻地

山河入卷 文脉长存

——读《寻迹湖北》

◎诸纪红

阔。这些文字如同高明的画家,以墨色浓淡勾勒出湖北的山水魂魄。

更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始终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紧密交织。登临古隆中,诸葛草庐的茅檐低小间,流淌着“鞠躬尽瘁”的赤诚;驻足荆州古城,斑驳的城墙砖石里,沉淀着“大意失荆州”的警世之思。在归元寺的晨钟暮鼓中,读者能触摸到禅宗文化的深邃;于曾侯乙编钟的余音里,可听见礼乐文明的回响。这种“以景载道”的书写,让山水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文明传承的载体。

书中对历史遗迹的探访,堪称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黄鹤楼上崔颢题诗、李白摘星的典故,将唐诗的璀璨星河投射在蛇山之巅;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让知音文化在九真山的溪涧中流淌千年。当作者站在赤壁古战场,眼前浮现的不只是“樯櫓灰飞烟灭”的战争场面,更是苏轼“大江东去”的旷达胸怀。这些历史碎片的拼合,构建起湖北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化核心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立体图景。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追寻古迹时始终保持着当代视角。在武当山紫霄宫,他既描绘建筑群“悬挂在悬崖上的故宫”的奇险,也思考道教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探访绿林寨古兵寨,既还原王匡、王凤起义的历史现场,也反思“绿林好汉”文化符号的当代转化。这种古今对话的写作姿态,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流动的文化血脉。

作为一部深度游记,《寻迹湖北》展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作者采用“双脚丈量+文化寻访”的双

重路径,既有与友人拾级而上黄鹤楼的现场感,也有对木兰替父从军传说的考据溯源。在襄阳春秋寨,他乘坐缆车俯瞰“天然太极图”的地理奇观;于野人谷密林,他带着对未知的好奇探寻“野人传说”。这种将个人体验与学术考据结合的写法,既保证了内容的严谨性,又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

在快餐式旅游盛行的当下,《寻迹湖北》提供了一种更深层的旅行范式。作者拒绝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游览,而是倡导“用心去旅行,用心去体会”的文化沉浸。在荆州关羽祠,他从“赤兔马亭”读到忠义精神的时代价值;于随州炎帝故里,他在青铜器纹饰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这种旅行方式,本质上是对文化根脉的追寻,是对“我们从何处来”的永恒追问。

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更具现实意义。黄陂泥塑“泥人王”的匠心传承,武当武术的养生智慧,恩施土家织锦的绚丽纹样,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在作者的笔下重获新生。当我们在书中看到耄耋老人精心雕琢泥塑罗汉,听到神农溪畔的船工号子,便能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博物馆里的静态保存,更是活态传承中的文化自觉。

合上这本书,长江的海声仍在耳畔回响。张健伟用文字搭建起一座桥梁,让读者得以穿越时空,与荆楚大地的山河对话,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共鸣。在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越发珍贵的时代,《寻迹湖北》不仅为旅行者提供了指南,更给予每个中国人重新认识文化母体的契机。当我们在书页间走过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山川城池,就懂得了,所谓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对脚下土地与历史长河的深情凝视。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慰藉

◎谢冬凌

周末,我漫步在林荫小径上,悠然走进一家掩映在繁花中的书店。迈过门槛,温煦而宁静的气息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咖啡与书香的交织。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木质书架上,仿佛在静候着有心人的采撷,我感觉一时摆脱了纷扰与疲倦。

我随手选了几本书,在书店一隅翻看起来。翻开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字里行间满是他对美食的深情。从北平的烧羊肉到福州的佛跳墙,从上海的大菜到山东的糟菜鸭肝,每一种食物在他灵动的笔触下仿佛都有了鲜活的味道。他不仅描绘了食物的滋味,更勾勒出那些与亲友共品佳肴的温暖时光。尤其是他回忆儿时母亲

特意为他买来小炸丸子,那份关怀与满足,如同春日阳光洒满心田,暖身又暖心。时隔多年,记忆犹新。

我喝一口咖啡,接着翻开蒋梦麟的《西潮》。这本自传性作品记录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转型与阵痛。书中不仅讲述了外来思潮如何冲刷并重塑中国的传统观念,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探索,每一段叙述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沉淀。

在一次次翻阅里,在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丰盈。我可以穿越至史铁生的世界,去看他眼中那随风摇曳的合欢树、北海金黄一片的

菊花、荒凉静谧的地坛,感悟生命的深邃哲思;可以步入小吏李善德的生活,感受盛唐时期一名普通打工仔如何完成将岭南新鲜荔枝运至长安皇宫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而他的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力量……

合上书本,午后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桌上。在这样的日子,手捧着书,无论是庄重的史籍,还是有趣的小说都能让人寻得慰藉和力量去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正如春天,复苏的希望在这墨香中悄然破土而出。

阅读,不仅是一场与文字的邂逅,更是一次与自我、与世界的对话。



阅读者

张晓东摄

夜读

◎涂俊明

我俩都已是古稀老者,过着标准的“空巢族”生活。在在职的岁月里,我在宣传部门工作,读书看报是我职业中的重要“标配”。我的职业习惯养成也渐渐影响了家人,妻子与我相濡以沫大半辈子,看我在家里经常阅读,自然而然地也喜欢读书看报了。

我坚持阅读,坚持自费订阅报刊。我与妻子的阅读是分时段错开的:白天是我收报刊、阅文稿,晚上,则是她看报纸、读杂志。

每晚她都读上一两个钟头,不会因此而影响睡眠。有道是,看报看题,看书看皮,她读东西是“挑肥拣瘦”的,她专挑有兴趣的读。对胃口的文章详读,细读甚至反复读,还经常会推介给我。实用实惠的科普文章是其最爱,“手机网络上的一些说法不可信,报刊文章经得起推敲,值得读!”她总是

这么说。

每每看着妻子捧着报刊夜读,我的思绪也沉静下来。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许多人越来越渴望找到一个角落享受宁静。安然的夜读,既远离喧闹,也是一种美的体现,因为这样的夜读,能让人感受到宁静与和谐。许多人选择去偏远的山区或海边,远离城市的繁华喧嚣,享受自然的美好,而对我来说,眼前是咱老婆的静静夜读,在家里,在厅堂,在沙发,是不是更有心旷神怡的温馨之乐?

有时候,我会问她:“你这么安静认真,都读到啥了?”

她应道:“你所说到的那些国事天下事,我可是都读到了呢!”

阅读与人生

几乎每天夜晚,妻子完成了各种张罗忙碌,终于坐到堂前的长条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之后,她先是打开手机,一目十行扫描一番新鲜事,然后便放下手机,翻阅当天送来的报刊。

近年来,夜读似乎成为她每天的必修课。这时的我则在一旁看看,问问:“是不是要续点茶水?”当然,我也是“听令行事”,且会很快离开,让她进入安静的夜读时光。